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忠祥 聂珍钊 主编

外国文学史

第一册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史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忠祥 聂珍钊 主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史(第一册)/王忠祥 聂珍钊 主编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ISBN 7-5609-2030-6

I. 外…

Ⅱ. ①王… ②聂… ③胡… ④姜… ⑤陈…

Ⅲ. 世界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N. I1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史(第一册)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忠祥 聂珍钊 主编

责任编辑:徐汉明
责任校对:张欣

封面设计:潘群
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2624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录排: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湖北毕昇印刷总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262 000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印次: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 000
ISBN 7-5609-2030-6/I·77 定价:16.5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科调换)

《外国文学史》编委会

主 编：王忠祥 聂珍钊

副主编：胡书义 姜岳斌 陈春生

执笔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胜民 王忠祥 邓年刚

叶绪民 田美丽 刘 渊

刘久明 吕伟民 吴祖明

宋寅展 张承举 张思齐

杨 建 杨传鑫 杨瑞仁

苏 晖 陈春生 姜岳斌

胡书义 聂珍钊 胡月新

唐红梅 夏腊初 莫自佳

彭江浩 谢岚岚 谭素钦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由国家社科八五、九五规划外国文学组成员、全国著名外国文学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忠祥教授和剑桥大学访问学者、英国学术院人文科学奖学金获得者、《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聂珍钊教授共同主编,全国十余所高校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本书吸收了国内外外国文学教材的优点和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采用了新的观念、方法和体系,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中阐述外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历史、文学思潮的嬗变过程和文学批评理论的衍化发展,坚持了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原则。本书集文学史、思潮史、文论史于一书,体例新,内容丰富。全套共分四册,近 130 万字,是为了适应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发展需要而编写的一部面向 21 世纪的外国文学史。本书是外国文学史教材,也是一部外国文学史研究专著,可作高等学校外国文学史教材,也可供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及研究工作者阅读参考。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第一章 古代希腊、罗马文学 | (26) |
| 一、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文学 | (26) |
| 二、古代希腊文学 | (36) |
| 三、希腊神话 | (57) |
| 四、荷马史诗 | (70) |
| 五、希腊戏剧 | (94) |
| 六、古代罗马文学 | (120) |
| 第二章 中世纪文学 | (148) |
| 一、中世纪的文化背景和欧洲文学的发展 | (148) |
| 二、但丁 | (164) |
|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 | (187) |
| 一、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文学 | (187) |
| 二、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 | (196) |
| 三、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 (202) |
| 四、意大利文学 | (210) |
| 五、法国文学 | (217) |
| 六、西班牙文学 | (226) |
| 七、英国文学 | (237) |

| | |
|--------------------------|--------------|
| 八、莎士比亚 | (248) |
| 第四章 17 世纪文学 | (278) |
| 一、17 世纪世界文学和欧洲文学 | (278) |
| 二、法国古典主义悲剧 | (288) |
| 三、莫里哀 | (300) |
| 四、英国文学 | (320) |

绪 论

顾名思义,外国文学不包括本国文学,系指本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它又必须与中国文学彼此呼应,相互关照。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由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的文学所组合而成的世界文学,多方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嬗变过程与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轨迹。就域外文学而论,在欧美文学史上,在亚非文学史上,出现过五光十色的文艺思潮和各具特色的表现方法,拥有像荷马、迦梨陀娑、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拜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泰戈尔、小林多喜二、高尔基、德莱塞、马哈福兹等许多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家。他们运用妙笔,通过各种形式描绘他们的时代,鸣奏他们喜怒哀乐的心曲,从而表达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量,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一定时代的文学是在一定的时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古今中外的文学,概莫能外。外国文学,包括外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是“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62页。

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①。

外国文学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形象地再现了人类从古到今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时代精神和社会阶级冲突。人类各民族的初民历史都是神话的历史,当然具有生活与幻想融为一体的特性。神话是古代人类长期的、集体的创造,是各民族最原始的文学样式之一,概括了他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常以诗歌、散文、戏剧、哲学、史学等方面的作品与论著为载体。毛泽东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解说。一方面肯定神话的基础是实际生活,它们表现人们幻想征服自然等,具有“永久的魅力”;另一方面强调“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互相变化在人们头脑所引起的主观幻想的变化,这就是说,神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②。我们既不能按照神话的图像,到现实中去寻找对应的事物,也不能把神话当作无稽之谈。这些意见,就是我们评价远古东西方各民族神话传说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理论基础。

古埃及的文学汇编《亡灵书》的文献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被人们誉为古埃及的“小百科全书”。它广泛地涉及历史、宗教、政治、哲学、艺术、心理学和民俗学,不仅在这些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形象化的“原材料”,而且具有比较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深远意义,已成为人类共有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杰作,反映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这一历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62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05页。

史阶段的各方面特征。荷马史诗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以战争为中心”的“荷马时代”的生活和理想，已成为人们研究古代氏族社会的重要文献，从古到今不少史学家从这里取用有关原始材料。古印度两大史诗是奴隶制王国纷争、种姓冲突、民族矛盾时代的产物，可作为当时包罗万象的文化知识总汇。我们认同中外一些学者的意见，一个人如欲了解印度的社会历史、印度民族的生活及其文化，就必须了解这两大史诗。现代印度著名作家拉贾戈帕拉查理曾说：“一个人旅行全印度，看到了一切东西，可是除非他读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至少是要通过一个好的译本读过），不然的话他不能了解印度的生活方式。”^①

意大利作家但丁的思想意识与以《神曲》为代表的创作中的矛盾，表现了“中世纪”和“新时代”交替阶段的社会冲突，即既有封建主义和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又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亚非中古时期较长久，也有不少名家的作品有启人睿智的作用，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伊朗萨迪的散文与诗歌合集《蔷薇园》、日本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等。《一千零一夜》早已脍炙人口，读者可从中获得丰富的社会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知识，了解中世纪阿拉伯广大人民群众的外在生活空间与内在精神世界。在欧美，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总趋势基本一致。资产阶级文库保存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科学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马克思在《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论及一批现实主义作家时，明确指出：他们的创作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认为，巴尔扎克的《人间

^① 转引《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中译本《序》（金克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

喜剧》汇集了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全部历史,从这里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列宁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断言,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他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社会的图画,他的观点和学说,也是“19 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

20 世纪欧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描写了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光怪陆离的景象,表现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内心感受、精神危机与理想追求。在欧美,从 19 世纪英国的宪章派诗歌、法国的巴黎公社诗歌等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到 20 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包括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倾向社会主义的作家作品),大体上反映了欧美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轨迹,展示了劳动群众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与良好的效应。比如,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可以说是 20 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斗争史的艺术概括。又比如,法国作家阿拉贡的长篇小说《共产党人》,歌颂了法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反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战斗精神,被人们称为“法兰西史诗”性的巨著。此外,丹麦小说家尼克索的代表作“三部曲”《征服者贝莱》、《蒂特一人的女儿》和《红色的莫尔顿》,获得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史诗”称号,我们可以从这里认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丹麦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与斗争状况,了解无产阶级的觉醒与壮大。

从总体上说,20 世纪欧美文学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个充满激变的时代的方方面面,展现了西方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过渡中的复杂而动荡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其社会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亚非文学发展史和亚非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相适应。亚非各国在各个时期的文学,是各国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在各自的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形成,描绘了亚非各国人民的生活与

斗争。已经提及的古代、中古亚非文学也是如此。近代、现代亚非文学，在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以民族民主革命文学为主流。人们既可以从这里看到人民革命的大好形势，又能了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的恶性后果、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旧文化意识的束缚。和近代亚非文学比较，20世纪（现当代）亚非文学具有更加鲜明的反帝、反殖、反封建性质。在一部分亚非国家的文坛上，无产阶级文学这支生力军显得特别活跃。通过亚非各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亚非各国人民觉醒的过程与前进的步伐。由此可见，外国文学所提供的资料 and 知识、思路 and 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与研究外国的历史与现状，丰富、武装我们的头脑大有好处。

一切优秀的外国文学，都能给人们以良好的教育与有益的影响。它所蕴藏的人民的战斗精神和生活智慧，对读者有毋庸置疑的思想启迪作用。过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资产阶级文学作品，确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但是它们还有憎恶、揭发社会黑暗，向往、讴歌美好理想，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一面，这些作品对于广大读者仍有思想教育意义。马克思曾高度赞扬全心全意为人类服务，敢于反抗任何反动暴力的普罗米修斯，古希腊文学中的这一英雄形象已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恩格斯真诚希望意大利出现一个“新的但丁”，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但丁写作《神曲》不是发泄他受贬黜的个人的孤愤，而是抒写广大人民群众对黑暗社会、残暴统治者的愤懑情绪与抗议。但丁及其创作所表现的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为追求真理而勇往直前、不断超越旧我的进取精神，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萨迪的《蔷薇园》中许多短小精悍的故事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对封建暴君的强烈诘难。他的政治观点与社会理想虽然局限于封建社会意识范围，但《蔷薇园》的教育作用却突破了这一范围。比如，第6章第6个故事：“暴君不可以为王，豺狼决不可以牧羊。国王对人民任意榨取，正是削弱了国家根基。”

作者在另一首诗中,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意见:“君王是树,民为根,树茂皆因植根深,万勿逞凶害百姓,害民犹如自掘根。”这里宣扬民心向背决定天下得失、“君”与“民”的关系如同树与根的关系,可能有规劝统治者为民向善的意图,但也是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这一类诗文对普通百姓也不乏教育作用,能启发人民群众明白自身的价值,并要求统治阶级尊重民意和关心民情,如其不然,可与之抗争。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从近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均有极富于教育意义的大量名作。

不仅古典作家(如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泰戈尔等)的作品,而且现代作家(如海明威、伯尔、格林、卡夫卡、萨特、川端康成等)的作品,均属此类。就其积极的方面来说,都能引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的深思,启发人们除恶向善,鞭答黑暗,迎接光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曾给保加利亚无产阶级革命家季米特洛夫以巨大的抗恶力量,在法庭上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描写了意大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鼓舞着无数后来的革命者。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英雄人物保尔,承认他受过牛虻英雄主义的影响。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一类的艺术家,“创造了可供群众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为自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的作品。”鲁迅在《祝中俄文学之交》一文中,回忆青年时代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说过,他发现这种文学“不亚于古人发现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在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大放光辉,思想内容更深刻,教育意义更重大。无论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还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都曾在我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教育作用。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教育诗”的作用,它曾鼓舞中国青年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延安道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

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显而易见，这里的教育意义是丰富的。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其中代表作家作品有：格罗斯曼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戈尔巴托夫的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柯涅楚克的戏剧《前线》、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等等。这些小说、诗歌、戏剧塑造了为捍卫祖国、反对法西斯而浴血奋战的英勇战士形象，讴歌了苏维埃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毅的英雄性格。人们从中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爱国主义精神力量的鼓舞。小林多喜二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培育出来的一批革命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小说《为党生活的人》凸现了日本共产党人组织领导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保卫人民利益的斗争这一主题。它在日本颇受进步人士的重视和欢迎，也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作品，中日广大读者不断地从这里受到革命的教育。

从文学史上看，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今与古之间，创作启示与艺术借鉴是必要的，而且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卓越的作家，在本国文学发展的土壤上，常常学习别国文学的长处，创作出具有自己民族风格和艺术特点的作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固然要继承自己的文学传统，但在其发展与革新中，都离不开其他民族文学的滋养。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的田园诗的启迪下写成《牧歌》，利用旧的艺术形式反映新的时代精神。他还借鉴了荷马的《奥德赛》，创作了严肃哀婉的意大利史诗《伊尼德》。《伊尼德》是“文人史诗”的典型作品。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不仅有的篇章取材于东方故事，而且从艺术上借鉴了《一千零一夜》的框形结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珂德》同样受过《一千零一夜》的启

示,尤其是在艺术结构与写作风格方面。莎士比亚写作的《哈姆雷特》这部深刻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哲学悲剧,也曾从“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历史传说与同时期英国舞台上演出的复仇悲剧中获得启示,并予以创造性的借鉴。法国作家伏尔泰从马若瑟译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纪君祥)中受到启示,改编成五幕剧《中国孤儿》。尽管《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比较,改动相当大,但对《赵氏孤儿》借鉴之处仍很多。在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显然有拜伦诗作的影响,启示与借鉴兼而有之。可贵的是诗人汲取了拜伦诗作的养分,抛弃了拜伦诗作的弱点,而且创作了“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近代、现代亚非优秀作家,往往以民族文学传统为基础,接受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影响,借鉴近代欧洲文学表现手法,以建立自己的新文学。

各国文学相互影响,彼此借鉴,乃是客观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都很重视艺术借鉴作用,他们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要求《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作者借鉴莎士比亚戏剧艺术,做到“莎士比亚化”。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劝导《城市姑娘》的作者学习巴尔扎克的艺术方法,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由此可见,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很不相同的。当然,“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①。外国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创作经验,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手法,可以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从“五四”时期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巨匠,到当代的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大都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得到过启示和借鉴。鲁迅的伟大艺术实践,当然以我国人民生活为源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但是,外国文学的影响对他来说也是不可缺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484页。

少的。鲁迅在《致董永舒》的信中说过：他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作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强调东欧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的影响，甚至认为他开始写小说时，曾得力于“先前看过的百来部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的创作（尤其是早期小说）与论著大力肯定外国文学的营养价值和启示、借鉴作用。郭沫若的早期诗剧，几乎与翻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1部同步进行。一般认为，郭沫若创作《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湘累》与《孤竹君之二子》，深受歌德的启示和影响。其实，他在1919年发表的《黎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也在歌德诗剧的影响范围之内。《黎明》呈现出“表演诗”的特性，却又具有诗剧的雏形，甚至可作出一出“儿童歌舞剧”。据郭沫若自己的解说，此剧是他学习象征主义戏剧《青鸟》（梅特林克）和《沉钟》（霍普特曼）“最初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儿童文学之管见》），这当然是可信的。不过，剧中充满了歌德式的浪漫主义的激情与诗意，借鉴歌德诗风也很明显。郭沫若读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剧，走出“玩偶之家”的娜拉形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从娜拉追求女性人格与自由的“叛逆精神”中获得启示，并在1923年写作的《卓文君》、《王昭君》等剧中留下了娜拉的“身影”。在郭沫若笔下，即将“出走”的卓文君、王昭君的言论，也有即将“出走”的娜拉的那种“雄辩”风格（为女性人格作辩护）。郭沫若借鉴易卜生戏剧透视中国社会面貌，针砭残害妇女的旧道德，提出“三不从”以反抗“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觉醒了的娜拉确实也曾批评他在家时被父亲当作玩偶，并且下定决心弃夫离子而出走。在这一点上，郭沫若接受易卜生的启示是很明显的。但郭沫若心目中的“三不从”以及他的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三不从”，却是一面崭新的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的大旗。郭沫若借鉴易卜生的戏剧，与他请出中国历史上的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三个叛逆的女性”的目的基本一致，实在是为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如此看来，外国文学

的启示与借鉴是不可少的,而怎样感受外国文学的启示,怎样有效地借鉴外国文学也许更加重要。

学习外国文学,还有助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论著,文艺论著以及其他有关学科专业。学习外国文学,还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促使我们掌握更多的从事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工作的实际本领。此外,学习外国文学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国际往来的需要,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有裨益。

二

早在1827年,德国诗人、剧作家歌德就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评《塔索》法文改编本),随后他又对艾克尔曼讲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输出和世界市场的开拓,不仅物质生产逐渐形成世界性的了,而且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精神产品日益成为公共的财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渊源及流变息息相关。文学与审美文化(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非审美文化(如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是沟通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的文学”,原意系泛指科学、艺术、哲学、历史等文化方面的,当然也适用于狭义的艺术文学。歌德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性的论断,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可从中体会作为子系统的文学与作为母系统的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里,我们先对这种关系略予解释,用以作为进一步探究“世界文学的时代”或“世界的文学”的“即将来临”的基础。翻开西方文化史,不难发现文化与文学的密切联系,如从横向考察,每一个断代历史